

胡德坤 主编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第九卷 战时德国对华政策

马振犇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第九卷

战时德国对华政策

马振犊 |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 胡德坤主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01-015054-3

I. ①反… II. ①胡… III. ①抗日战争—研究—中国 IV. ①K2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8832 号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FAN FAXISI ZHANZHENG SHI QI DE ZHONGGUO YU SHI JIE

胡德坤 主编

责任编辑: 岳改苓

封面设计: 九 五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 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 65250042 65258589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1.5

字 数: 312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5054-3

定 价: 798.00 元 (全九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目 录

Contents

※ 第九卷 ※

战时德国对华政策

引 言	1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德国对华政策与德中关系	7
第一节 德中关系的历史回顾	7
一、德中两国的历史关系渊源	7
二、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与德国的历史关系	10
第二节 “单纯而完美”——九一八事变前的德中关系	18
一、《中德关税条约》的签署与中德苏三国同盟的设想	18
二、全德工业联合会访华	21
第三节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德国军事顾问团	23
一、德国军事顾问团的缘起	24
二、鲍尔在华组建顾问团引起德中交涉	25

三、内外交困——克里拜尔顾问团引起的外交波折	37
------------------------------	----

第二章 德国与伪满洲国 42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德国的态度	42
-----------------------	----

一、九一八事变与德国的态度	42
---------------------	----

二、德国不承认伪满洲国	52
-------------------	----

第二节 希特勒上台后与德国对华政策	61
-------------------------	----

一、希特勒对中日两国的看法	61
---------------------	----

二、海耶事件与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	66
------------------------	----

第三节 德国与伪满洲国关系的升温	73
------------------------	----

一、德国远东经济考察团访问伪满洲国	73
-------------------------	----

二、《德“满”贸易协定》的签订	79
-----------------------	----

第四节 德国与伪满洲国关系的加强	83
------------------------	----

一、德日结盟与德“满”关系的发展	83
------------------------	----

二、德国承认伪满洲国	85
------------------	----

三、建交后的德国与伪满洲国	95
---------------------	----

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后的德国对华关系 100

第一节 德国政局的变化及其对华政策的调整	100
----------------------------	-----

一、纳粹党上台	100
---------------	-----

二、法西斯主义对中国政坛的影响	109
-----------------------	-----

第二节 德国与德国赴华军事顾问团	114
------------------------	-----

一、佛采尔赴华	114
---------------	-----

二、德国顾问团的扩大与改组	116
---------------------	-----

三、德国顾问团对中国军事的渗透	121
-----------------------	-----

四、德国政府与德国顾问团	124
--------------------	-----

五、德国顾问团的困扰	127
------------------	-----

第三节 德国与中国国防	133
一、德国“国防军之父”的来华使命	133
二、塞克特设计的中国军事整顿方案	142
三、法肯豪森与对日作战方案设计	151
第四节 抗战爆发前的中德日关系	163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德日三角关系	163
二、德国重整军备及其对华政策	166
三、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与中德交涉	175
 第四章 德国与中国对日抗战准备	 190
第一节 合步楼计划	190
一、德国与两广当局的军工合作	190
二、围绕两广方案而引发的中德交涉	195
三、克兰的广东计划	197
第二节 中德易货通道的建立	199
一、克兰与孔祥熙签署《中德易货合同》	199
二、广州风波的平息	202
三、克兰与翁文灏的会谈	208
四、顾振代表团访德与《德华信用借款》的签署	213
第三节 德国抗战爆发前的中国国防	220
一、德国与中国重工业	220
二、德国与中国兵工制造业	238
第四节 抗战爆发前的德国军火输华	244
一、《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签署前的德国军火输华	244
二、德国国家资本与德国军火输华	247

第五章 抗战爆发后的德国对华政策	253
第一节 德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	253
一、德国面对中日战争左右为难	253
二、陶德曼调停	267
第二节 德国与中国全面抗战	280
一、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国抗战	280
二、孔祥熙访德及其成果	293
三、德国军事顾问团引发的德中日交涉	298
四、德国军火物资继续输华	316
第六章 德中断交及德国与汪伪政权的关系	334
第一节 德中断交及中国对德宣战	334
一、德国开始疏远中国	334
二、德国承认汪伪政权	336
三、德中断交及中国对德宣战	340
四、断交宣战后的中国对德事务	344
五、遗留的特别通道——韦尔纳在重庆	345
第二节 德国与汪伪政权的交往	347
一、汪伪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及追随德国对英美宣战	347
二、德国与汪伪“收回租界和撤销治外法权”	351
三、德汪关系的终结	355
本卷综论	357
参考文献	364
后 记	366

引言

本卷主要研究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德国对华政策和德中双边关系,重点考察战时德国对华政策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

对于这一时期德国对华政策及德中双边关系的研究,德国学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曾投入很大精力,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资料汇集方面,汉斯·洛特菲尔斯、弗里茨·T. 埃贝斯泰因等主编的多卷本《德国外交政策档案(1918—1945)》^①相继出版,内中涉及德国对华政策及德中关系的材料相当丰富,成为研究这一课题的必读文献;郭恒钰、罗梅君主编的《德国外交档案——1928 年—1938 年之中德关系》^②,为寻访研究这一课题所必需的德方档案文献提供了基本线索;阿尔封斯编著的《1860—1945 中德关系书目》^③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罗梅君主编的《德国与中国文献汇编(1937—1949)》、《“样板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膨胀:德中关系文献汇编(1897—1914)》^④对研究这一课题也有很大贡献。除了编纂文献外,德国学者在德国对华关系和德中双边关系方面也有一批论文、论著问世,其中以贝德恩·马丁、郭恒钰、罗梅君等人的研究最为深入,对本卷作者启发较多。贝德恩·马丁关于这一课题的主要著作有《世界强权抑或衰落? 二十世纪德国的大国政策》、《德

① [德]汉斯·洛特菲尔斯、弗里茨·T. 埃贝斯泰因等主编:《德国外交政策档案(1918—1945)》(Hans Rotfels, Eritz T. Eberstein u. a. (Hrsg.),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 - 1945*)。该书分卷出版,出版时间、出版地因卷而异,本处不一一罗列。

② [德]郭恒钰、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主编,许琳菲、孙善豪译:《德国外交档案——1928 年—1938 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丛刊》(11),1991 年。

③ [德]阿尔封斯:《1937—1949 中德关系书目》,柏林学术出版社 1998 年版(Mechthild Leutner,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37 - 1949, Dokumentensammlung*, Akademie-Verlag, Berlin, 1998)。

④ 两书分别于 1997、1998 年由柏林学术出版社出版。

国顾问在中国,1927—1938:军事—经济—外交》(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与日本:从偷袭珍珠港到德国投降》;郭恒钰、罗梅君主持的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不仅对推动学界关注德中关系史研究付出了很大努力,而且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德国与中国:300年跌宕起伏的关系》(郭恒钰主编)、《从殖民政策到合作:德中关系研究》(郭恒钰主编)、《德国与中国》(郭恒钰、罗梅君主编)等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①

美国学者早在中国开展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即已关注德国的远东政策与对华关系。1940年,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出版库尔特·布洛克的《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策》^②一书。该书出版后,曾引起广泛关注。20世纪50年代后,美

① 德国学者关于德国对华政策与德中双边关系方面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尚有:卡尔·德累克斯勒:《1933—1939年的德国—中国—日本:德国远东政策的困境》,柏林学术出版社1964年版(Karl Drechsler, *Deutschland-China-Japan 1933 - 1939: Das Dilemma der deutschen Fernostpolitik*, Akademie-Verlag, Berlin, 1964);纪晨:《1933年前的德中关系》,汉堡亚洲研究所研究报告第5辑,1973年(Chen chi,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bis 1933*, Mitteilung des institutes für Asienkunde Hamburg Nr. 5, Hamburg, 1973);汉斯-阿多夫·雅可布逊:《纳粹外交政策(1933—1938)》,莱茵河畔法兰克福/柏林1986年版(Hans-Adolf Jacobso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ssenpolitik (1933 - 1938)*, Frankfurt am Main/Berlin, 1968);约阿希姆·派克:《没有殖民地的殖民地主义:1937年德帝国主义在中国》,柏林学术出版社1961年版(Joachim Peck, *Kolonialismus ohne Kolonien, Der Deutsche Imperialismus und china 1937*, Akademie-Verlag, Berlin, 1961);卡尔·梅奈尔:《德国军事顾问作为德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华利益代表的角色(1928—1936)》,莱比锡1961年版(Karl Mehner, *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ä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 china 1928 - 1936*, Diss, Leipzig 1961);聂有溪:《中日华北冲突的发展及德国的调停努力(1937—1938)》,汉堡亚洲研究所研究报告第33辑,1977年(Nieh Yu-his,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onfliktes in Nordchina und die Deutschen Vermittlungs bemühen 1937 - 1938*,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 33, Hamburg, 1970);乌多·拉腾霍夫:《德意志帝国的中国政策(1971—1945):经济、军备、军事》,莱茵河畔博帕德,哈拉德·波尔特出版社1987年版(Udo Ratenhof, *Die China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71 bis 1945: Wirtschaft-Rüstung-Militär*, Haarald Boldt Verlag, Boppard am Reihn, 1987);沃尔夫冈·米夏尔卡:《里宾特洛甫与德国的世界政策(1933—1940):第三帝国的外交方案与抉择过程》,慕尼黑威廉·芬克出版社,1980(Wolfgang Michalka, *Ribbentrop und deutsche Weltpolitik 1933 - 1940*, Aussenpolitische Konzeption und Entstehungsprozesse im Dritten Reich, Wilhelm Fink Verlag, München, 1980)。

② [美]库尔特·布洛克:《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策》,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1940年版,纽约AMS出版社1978年再版(Kurt Bloch, *German Interests and Politics in the Far Eas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New York, reprinted of the edition of 1940, AMS PRESS Ins., New York, 1978)。

国从事德中双边关系研究的学者虽然人数不多,但所取得的成就^①格外引人注目。柯伟林教授(Prof. William C. Kirby)的《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②出版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学界公认为德中关系研究方面的压卷之作。《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的重要贡献在于,作者运用了大量以德美方面档案为主的文献材料和许多来源于作者艰苦细致访问的口述回忆等非文献材料,厘清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德中双边关系的基本脉络,将德国顾问团的来龙去脉、德中易货贸易的前因后果、部分重大的外交事件等许多基本史实加以澄清,作者对这一时期德中关系的整体把握和全书的基本结论也令人信服。当然,《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也不是一部“完书”,书中对于中国方面的档案征引虽然不少,但部分地方尚不够充分。如在谈到德中合办的中央炼铜厂等几个项目时,大多语焉不详,令人难以捉摸,且将原因归咎于“材料很少”,而事实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资源委员会及直属机构相关档案非常丰富。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历史档案(尤其是民国档案)向学界大规模开放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柯伟林从事这一课题研究时,档案开放的力度和学界的关注度远非今日可比,《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某些不够充分之处可以说是“历史的遗憾”,而非作者的过错。

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60年代后即有学者从事中德关系史的研究。李国祁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不过李先生的研究范围多在晚清和民初,对国民党统治时期涉猎不多。自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张水木、周惠民、傅宝真、辛达漠等致力于德国对华政策与德中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傅宝真对德国顾问团的研究、周惠民对德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及张水木对中德双边关系的研究,均不乏建树,对本卷作者启发良多^③。

① 除了下面提到的柯伟林的《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外,美国学者关于德中关系的相关成果还有:毕立·K. 沃希:《德国在华军事代表团(1928—1938)》,《现代史杂志》第46期,1974年(Billie K. Walsh, "German Military Mission in China, 1928 - 193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No. 46, 1974);约瑟夫·费思:《孙中山与德国(1921—1924)》,《东方档案》第36期,1968年(Josef Fass, "Sun Yatsen and German in 1921 - 1924", *Archive Oriental*, 36, 1968);洛恩·尤金·葛莱姆:《中德关系(1919—1925):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外交、经济及文化重返中国》(Lorne Eugene Glaim, *Sino-German relations, 1919 - 1925: German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culture reentry into China after World War I*),华盛顿州立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

② [美]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③ 参见张水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外交关系之演变(1919—1939)》(台大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85年)、周惠民《德国对华政策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傅宝真《德籍军事顾问与抗战前的中德合作及对军事的贡献》(台湾民生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

中国大陆地区对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后,始有学者开始关注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陶德曼调停、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德中易货贸易等几个方面。关于陶德曼调停,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当可观^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建朗的《陶德曼调停中的一些问题的再探讨》^②。王文引用了大量的德方材料,对陶德曼调停是“日德帝国主义的勾结”、是国民党政府“卑鄙无耻的投降行径”的传统观点予以澄清,认为德国在陶德曼调停中的态度基本上是中立的,没有“超出一个递信员的地位”;国民政府一方面固然期望能达成永久停战,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对此抱有幻想,即使议和不成,也可利用短期的停战得一缓兵之机,在军事上喘一口气。此外,由于调停是在国民政府高级决策人士中间秘密进行,外界知者甚少,因此对于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并未造成实际影响。关于德国军事顾问团,这一时期亦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文^③,学者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的原因、工作状况及顾问团在中德关系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值得指出的是,由于顾问团本身所独有的神秘色彩,这一时期一些非史学工作者撰写了一批与此相关的通俗类读物。此类读物对人们了解民国时期的德中关系有一定作用,但错误与杜撰亦比比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学界对顾问团的研究对于史实重建、正本清源贡献甚大。如何友良的《赛克特并未为蒋介石制订碉堡战术》即是很典型的例子。关于德中易货贸易,这一时期的

① 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除了后述王建朗文外,尚有蔡德金、杨立宪:《陶德曼“调停”初探》,《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杨玉文、杨玉生:《中日战争初期纳粹德国“调停”活动内幕及其结局》,《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刘昭豪:《重评陶德曼调停》,《湘潭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马骏:《日本侵华后的中德关系及其变化》,《世界历史》1989年第3期;胡献:《简评陶德曼“调停”期间蒋介石的对日立场》,《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李广起:《1937年底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利益所在》,《南开学报》1992年第3期;等等。

② 王建朗:《陶德曼调停中的一些问题的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③ 相关研究成果有吴白天:《德国军事顾问与蒋介石政权》,《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孙果达:《国民党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与蒋介石政权》,《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李兰琴:《德国来华军事顾问团活动初探》,《晋阳学刊》1989年第4期;费路、陈谦平:《国民党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近期研究述评》,《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张宪文:《30年代中德关系初探》,《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何友良:《赛克特并未为蒋介石制订碉堡战术》,《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李乐曾:《赛克特在华活动述评》,《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何兰:《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德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朱孔宝、单卫华:《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对华作用之评价》,《学术界》1999年第5期;李乐曾:《关于赛克特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等。

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就笔者所见,与此相关的论文仅有吴景平的《汉斯·克兰与抗战前的中德关系》(《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陈谦平的《抗战初期的中德钨砂贸易》(《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等寥寥数篇,其中吴景平文依据的是德方材料,旨在探讨汉斯·克兰在德中易货贸易中所起的作用,陈谦平依据的中方材料(主要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资料),重点探讨在中德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钨砂贸易,并对国民政府的所谓“钨砂外交”进行了评述。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这一时期学界对德中关系的研究有三点值得一提。一是部分学者试图从宏观上对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中德断交的中德关系进行研究,尝试厘清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德双边关系的基本走向。张北根的系列论文《1927至1933年的中德关系》(《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1933至1937年的中德关系》(《档案史料与研究》1995年第2期)、《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即是这种努力的典型代表^①。二是相关研究团体(如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研究期刊(如《中德关系史文丛》)开始出现。三是专题史料汇编陆续公开出版(如马振犊主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可以说,中国大陆地区的德中关系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确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① 相关研究成果尚有李兰琴:《试论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30年代后期德国对华政策浅析》,《中德关系史文丛》第1辑;方世敏:《中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德关系走向述评》,《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易豪精:《从“蜜月”到断交——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陈红民:《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何兰:《试论1938—1941年的中德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钱娥芬:《1928—1938年的德中关系》,《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等等。

最近十年关于民国时期德中关系的研究^①,较为重要的成果为陈仁霞的《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②。陈著在利用中、德、日三方文献的基础上,对三国的外交政策、双边关系和三边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1936—1938年,围绕中日两个远东大国,国际上存在着中苏日、中美日、中英日、中法日等多种三角关系,但它们对东亚地区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都不如中德日三角关系的影响大,因为中德日三国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战略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这三个国家之中,任何两个国家的关系性质——无论是对手关系还是合作关系,都对第三国的安全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国力悬殊与战略利益的不同,三国在处理三角关系的基本策略上存在较大差异。德国在三角关系中最为强势,自然成为中日两国都要拉拢的对象,双方都要在同德国的合作中使自己受益,使对方受损。在这种状况下,一旦中日关系全面破裂,德国迟早都必须在中日之间作出选择。此外,尽管三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德日三国的对外政策,但它并不是影响这三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唯一因素,德国最终弃华亲日及中国主动与德国断交,当然也并非三角关系所能涵盖。

多年以来,本卷作者十分关注学界研究民国时期的德中关系的状况,亦有部分不成熟论文、论著问世。本卷在写作过程中,对于前贤学者的研究成果,私以为然者,征引甚多,均于注释(或正文)中标出,以示学有所本;不以为然者,则直抒己意,不作特别说明。要之,学问之事,我言我所见。至于本卷中的错误或疏漏,作者愿接受学界的公正评判与指教。

① 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除后述陈仁霞著作外,尚有章百家:《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百年潮》2004年第9期;陈仁霞:《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始末——中德日三角关系背景下的历史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单卫华:《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原因论析》,《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陈晖:《抗战爆发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史义银、印少云:《中德钨锡交易和国民政府的外交对策》,《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陈振国:《蒋介石对克兰广东计划态度摇摆的原因》,《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王建华、翟海涛:《德国顾问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现代化中的作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孙红国:《试析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对华“工业外交”》,《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周建明:《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德钨砂贸易》,《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王春:《1928—1938年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地位与作用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王春:《1928—1938年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国国防工业建设》,《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等等。

② 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 德国对华政策与德中关系

第一节 德中关系的历史回顾

一、德中两国的历史关系渊源

在古代中国对欧洲的外交关系中,对德国的关系是颇具特色的。其原因之一是,在当时的欧洲,德国日耳曼民族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禀性。在中国人看来,德国民族具有执着、有条理、忠诚及思想深奥的特点,是一个“具有持久耐性和充沛活力的民族”。

德国人最早是从马可·波罗的《东方旅行记》中得知中国这个远东古国存在的。1752年,德国商船“普鲁士国王号”经过长途远航抵达广州,开始了中德双边商贸往来的历史,这也是中德两国最早开始的正式交往。当时,德国还是一个尚未统一的由各大小邦国组成的国家。经过历代传教士的不断努力,中国的文化传到德国,引起了德国人浓厚的兴趣,在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及文学家、诗人歌德的作品中,都有关于中国的描述与评论,普鲁士王公贵族都以拥有中国的产品为自豪。

在当时德国人的心目中,中国这个远方古老的国家是智慧与文明的象征,充满了东方神秘的意味。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对西方列强敞开大门,中德关系也发生了

实质性的改变。德国效仿英法列强,以枪炮打入中国,攫取了大量的殖民利益,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双边不平等条约。

1871年,德国完成了内部统一,“铁血宰相”俾斯麦(Bismarck)全力支持向海外扩展德国势力,德国联合俄、法参与了甲午中日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并进一步武力侵占了中国山东胶州湾,对中国进行侵略与蚕食。

1900年在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德军元帅瓦德西(Waldersee)又担任了“八国联军”总司令,指挥德军等侵略中国。战后,德国还从《辛丑条约》中向中国勒索了1.966亿两白银的“战费赔偿”。这时的德国已成为一个十足的西方侵略者。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德国与西方列强“保持一致”,支持袁世凯夺取政权。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联合意大利、奥地利对英法俄开战。北京政府宣布“严守中立”,但德国在山东之资产利益不久即被日本趁机攫取。1917年3月,北洋政府宣布与德国绝交,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这是中德关系史上第一次正式宣战。次年11月,德奥战败投降,然而在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以“战胜国”之一的地位不仅没有“收回国权”,反而又被“战胜国”列强欺辱,将德国在山东特权正式移交日本,由此引发了中国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新成立了魏玛(Weimar)共和国政府,担负了重建德国之重任。这时的德国已经沦为一个战败国,失去了全部的海外殖民地,经济千疮百孔,社会动荡不安,各战胜国通过巴黎和会签订《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套上了一副副政治、经济、外交枷锁。魏玛共和政府为了打破困境,急于恢复大国外交地位,在中德关系正常化方面采取了主动的步骤。1920年,德国政府派代表卜尔熙(Borch)来华,试图与拥有广大市场的中国恢复商贸往来,为拯救战后德国千疮百孔的经济创造条件。卜尔熙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声明:德国政府愿意“恢复中德之友谊及通商关系,因此项关系应基于完全平等及真切相互之主义,合于普通国际法之条规者”^①。他声明:德政府“允许取消在华之领事裁判权,抛弃德国政府对于德国驻京使署所属操场上之全部权利于中

^①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国……”

1921年7月1日,德中双方在北京举行了新签《中德协约》换文仪式,这份文件宣告:“大中华民国政府、大德意志共和国政府,愿意以本日大德意志共和国声明文件为依据,两国订立协约,恢复友好及商务关系,并觉悟领土主权之尊重与夫平等相互各种原则之实行为维持各民族间睦谊之唯一方法。”^①这份协约是中德关系史上第一个平等的条约,标志着中断四年的中德关系正式恢复。

20世纪20年代,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人正在与把持民国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集团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在这场关系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斗争中,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较大,国民党人不得不借助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为北伐革命事业服务,其中便包括了借助于外国的势力和经济支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在世界列强中唯一可以给予革命党人帮助的,便是同样正在遭受失败的德国。

德国之所以愿意与中国在野的反对派发生关系,原因有二。第一,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其已失去在华列强之一的地位,事实上再也不能与英美等国共享特殊权利;第二,北洋政府的对德宣战使德国对其失去了友好与信任,转而希望中国有新的政权上台。而德国的这种态度正适合了孙中山革命党人的需要,双方一拍即合,开始了暗中接触与合作。这种合作直接为后来几十年间国民党当权者与德国的密切关系奠定了基础,在中德外交乃至民国外交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上所述,在中德关系发展史上,到清朝末期,德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充当了侵华的急先锋。它曾公然出兵霸占中国胶州湾,扩大在华势力,进行了赤裸裸的侵略与掠夺,并参与了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阴谋活动,随后又扶植北洋军阀北京政府继续对华进行侵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北京政府在协约国列强怂恿下对德宣战并取得了“胜利”,虽然并未“收回国权”,但却从此改变了中德双方的地位,德国由列强之一沦为战败国,中国从被侵略国一变而为战胜国,双方地位由此接近,德国主动放弃了其部分在华特权,而中国也主动结束了对德战争状态,中德关系在表面上得以

①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第121页。

“平等相处”，使双方关系呈现出了在当时中国屈辱外交中与众不同的一点“特色”。此乃今后几十年中华民国领导人始终对德满怀甚至带有某种偏爱的“友好之情”的根源所在，也是中德友好关系得以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二、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与德国的历史关系

（一）孙中山时期与德国的关系

孙中山在其领导的推翻清王朝及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中，形成了一套代表革命党人的外交理论及方针。孙中山认为，为了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必须尽可能地争取西方强国的援助，而在列强各国之中，德国便是其谋求外援的重点对象之一。“国父认为可作中国之友者，应为美国与日本，其次即为德国。”^①

早在1913年，孙中山就曾提出过一种创建“大陆同盟”区域组织的设想，他计划以中、俄、德、奥、土（土耳其）、波（兰）六国为核心成立联盟，以树立国际上另一新兴势力。2月间，孙中山在日本访问时，曾与日本首相桂太郎谈及此一设想，并曾计划派其秘书戴季陶为代表，赴欧联络各国，只因经费困难，终未成行。^②由此可见，当时孙中山将中德联盟视为欧亚大陆和平稳定的基础因素之一。

孙中山在旅居欧洲时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过德国的历史，并曾数次访问过德国。在他的眼中，德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俾斯麦政府则是欧洲“最有竞争力的政府”，一个“真正的万能政府”。他赞赏俾斯麦武力统一德国并“通过不断增强的支持与社会福利的增加”来巩固国家的手段。他把德国的经验融会到他的三民主义之一“民生主义”的理论之中，希望吸收德国在社会改良与发展方面的经验，“运用国家的权力来缓和工人的贫困”。孙中山认为，德国不但在科技知识上有卓越的表现，即其建国之经验也多可为我所借鉴。他说：“俾斯麦实行的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这一原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生主义。”^③孙中山还说：“以国际地位言之，其与吾国利害相同，毫无侵略顾忌，而又

① 傅启学：《中山思想本义》，台北国父遗教研究会1981年编印，第140页。

② 黄季陆：《孙中山先生与德国》，台湾《中华学报》第7卷第2期，第50页，1980年版。

③ 张其昀：《国父思想与德国文化》，载《中德文化论集》，（台湾）正中书局1966年版，第1—2页。